

试述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

刘军

内容提要 元魏宗室墓志是洛阳邙山出土碑志的集中代表,其秉承六朝贵族主义精神撰写,凸显中古北方胡人贵族化运动的观念及成果。标榜文化素养是该类墓志的核心环节,细致剖析其结构元素,不难发现引领贵族时尚的江南新风占据相当的比重,具体包括玄谈、文学、宴饮、务虚、义理及书法等内容。在贵族化浪潮的席卷下,元魏宗室的气质风貌日益趋向江南化,此乃南北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文化史上叙写了绚丽的篇章。

关键词 元魏 宗室墓志 江南时尚 文化修养 贵族化

刘军,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130012

元魏宗室墓志是河南洛阳城北邙山出土碑志的大宗,乃透视中古北方社会与民族融合情势的重要资料。所谓“宗室”,特指元魏皇帝的亲族,涵盖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内徙胡人勋贵的总代表,元魏宗室构成王朝统治的根基,决定了政局演变和族群发展轨迹。元魏宗室墓志秉承门阀贵族主义思潮写就,高调标榜身世背景,烘托家格门第,渲染学识素养,反映出日新月异的生存境遇与官僚文士化的整体趋势。应该注意到,置身中原的元魏宗室并非固守传统习俗与河北学术的壁垒,而是兼容并蓄,积极吸纳同期江南的时尚新风,将其融入日常行为习惯和思想意识,进而构成心态价值取向之重要部分。此乃南北文化交融的客观体现,亦为北方民族进化的全新动向。故笔者结合中古学术的恢宏场景,试对元魏宗室墓志中的江南元素加以阐释,从文化视角管窥五世纪前后的中国南北关系。学界在此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何德章《北魏迁洛后胡人贵族的文士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第6期)均值得借鉴,然尚有继续拓展的空间和必要。

一、设定研究工具——中古南北学风之差异

惟有准确捕捉文化场域的江南元素,方能使论证坚实可靠。所以,在正式接触元魏宗室墓志之

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行国体制研究”(编号14D031);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科学前沿与交叉学科创新项目“北魏宗室阶层士族化进程研究”(编号2012QY046);吉林大学“985工程”建设基金项目资助。

前,有必要交代下材料甄别的标尺,即中古南北学风差异问题。魏晋以降,国家分裂,政治扰攘,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桎梏彻底打破,学术下移,地域特征显著的家学取代中央官学成为文化中心^[1]。地缘文化最大的差异莫过南北之辨,六朝名士无不关注于此,细加探究。《世说新语·文学》:“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这种概括性的评述令人实难理解,详细说来有如下要点:在传承关系上,北学是汉代河北经学的孑遗,南学是魏晋河洛新风的延续;在研究对象上,北学专攻儒家经典,南学选择弃儒入玄;在学术风格上,北学艰深刻板、务求甚解,南学清新洒脱、超旷自然;在治学方法上,北学偏重名物的训诂考据,南学倾向义理的诠释阐发;在价值取向上,北学保守务实,南学放诞虚玄。于是,长江南北呈现截然不同的文化特质,塑造了性格迥异的士林风貌。若勾勒生动的肖像,北方学者多为皓首穷经、不苟言笑的宿儒,南方士人则是狂放不羁、崇尚自我的贤达。

中古时期,随着南北士人大频度的空间转移,南北文化冲突席卷中国。具体来谈元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平城迎来了南朝降臣,位居侨姓冠首的琅琊王肃,他与北方鸿儒刘芳的争辩如实反映了这种情况。《魏书》卷五五《刘芳传》:“高祖宴群臣于华林,(王)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刘)芳曰:‘推经《礼》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母,鸡初鸣,栉櫛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酒阑,芳与肃俱出,肃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足见,浩繁生涩的礼经不是王肃等江左名士之旨趣,故浅尝辄止;刘芳则意兴盎然,旁征博引,考辨精审,充分张扬北方学者之风采。这种差异还延伸到生活习惯上,南方雅士喜好品茗、饮鲫鱼羹,北人却戏称之为“酪奴”、“水厄”,彭城王元勰揶揄王肃之流道:“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领军元叉讥讽萧衍之子萧正德:“卿于水厄多少?”^[2]类似事例在元魏洛阳时代司空见惯,文人间的戏谑无伤大雅,有对立却决无歧视,在宽松自由的氛围里,南北精英相互争衡、各领风骚,把帝国的政治中心变成文化汇聚的熔炉。

毋庸置疑,洛阳文化是典型的多元层叠架构,但各类因素的配比并不均衡。早已臣服拓跋的河北大族凭借踏实稳健的作风占领了思想高地,包括宗室在内的众多胡人勋贵与之长期接触,难免先入为主地对其产生认同感。钱穆说:“五胡杂居内地,已受相当汉化。但彼辈所接触者,乃中国较旧之经学传统,而非代表当时朝士名流之清谈玄理。”^[3]即为此意。宗室等胡人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遍任要职,励精图治,巩固政权,入世精神浓郁的河北学术刚好满足需要,故尔大行其道,甚至成为主流价值观。但随着贵族化运动兴起,承袭魏晋名士风范,引领士族潮流的江左时尚逐渐走俏,在厘定姓族过程中抢占先机的宗室纷纷装点、趋之若鹜。于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江南元素潜移默化间步入宗室心田。

二、江南元素在元魏宗室墓志中的体现

元魏宗室墓志是中古内徙胡人贵族化运动的产物,它奉贵族思想之圭臬,以贵族文学的形式,彰

[1]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0页。

[2]杨衒之、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三《城南·正觉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48页。

[3]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79页。

显贵族的身份,描绘贵族的特征,表达贵族的诉求。这里所谓的“贵族”,决非上古世卿世禄的宗法贵族,亦非草原部落的血亲贵族,而是主宰六朝社会的门阀士族,即凭借累世积淀的家世背景,在婚姻、仕宦及家学门风方面形成稳固显著特征,并为社会和国家所认可,因此享受特殊权益,同时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的家族群体或特殊阶层。由概念可知,文化是元魏宗室贵族化不能回避的要素,自然构成墓志的主体内容。研究证明,元魏宗室的品质架构是多元混杂的,北人气质虽不容撼动,但引导贵族时尚之江南元素广泛存在颇令人瞩目。现据前文所述衡量标准,对其进行集中探讨。

玄谈是江南名士的招牌,具有贵族文艺沙龙的性质,乃中国古代哲学之高峰。它以东汉清议题目为现实素材,借助三玄老、庄、易构建理论体系,运用抽象思维论证有无、本末、体用、名实、言意、动静、自然名教等命题。田余庆发现,由儒入玄是江左士族维持门第的需要,玄学压倒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胜利者^[1]。向往贵族制度的元魏宗室必然紧密追随。实际上,玄学在北朝流传甚早,“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2]。贵族化运动后则愈演愈烈,宗室擅长谈玄成为地位升晋的资本,墓志因此跟风反馈。《元鸾墓志》:“虚心玄宗。”^[3]《元显俊墓志》:“载笑载言,则玄谈雅质。”^[4]《元煥墓志》:“味道入玄,精若垂帷。”^[5]《元怿墓志》:“世宗之在东宫,特加友异,每与王谈玄剖义,日晏忘疲。”^[6]《元彝墓志》:“清思参玄,高谈自远……玄言内蕴,远鉴外昭。”^[7]《元湛墓志》:“口不论人,玄同阮公。”^[8]《元子正墓志》:“穷玄尽微,义该众妙。”^[9]《元钦墓志》:“高谈天人之初,清言万物之际,虽林下七子,不足称奇。”^[10]《元袭墓志》:“工名理,善占谢,机转若流,酬应如响。”^[11]《元显墓志》:“工名理,好清言。”^[12]元魏宗室知识基础薄弱,玄学造诣不宜高估,这种热忱主要是迎合门阀体制,为提升姓族等第积累条件,同时搭建与士族阶层的沟通平台,达到巩固统治之目的。

文学自觉始于魏晋,它浓缩了六朝贵族社会的时尚动向,是名士驰骋才思的领域。江东作为文学新风的策源地,不断向北方扩张影响。北魏孝文帝格外青睐文学,史载他“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13]。受此引导,宗室对文学的热衷程度空前高涨,呈现“衣冠仰止,咸慕新风”的局面^[14]。关于宗室作品的风格特质,详参周建江《北魏皇室文学述论》(《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5期),兹不赘述。墓志中大量宗室钟情文学的资料亟待挖掘。首先,不少宗室生前以文学为晋身途径。《元祐墓志》:“游心文苑,访道忘食。”^[15]《元尚之墓志》:“属辞韵彩,彪炳离文。”^[16]《元熙墓志》:“文藻富赡,雅有俊才……文艺之美,领袖东观。”^[17]《元怿墓志》:“文华绮赡,下笔成章。升高睹物,在兴而作。”^[18]《元湛墓志》:“元好文藻,善笔迹,遍长诗咏。”^[19]《元赞远墓志》:“博窥文苑……登高夹池之赋,下笔成章。”^[20]其次,宗室文学佳作锋出,不乏高产作家。《元延明墓志》:“诗赋铭诔,咸颂书奏,凡三百余篇。”^[21]宗室还是北朝墓志碑铭的主要创作群体,《元扬墓志》由季弟元钦作^[22],《元举墓志》由幼弟元景文作^[23],《元道明墓志》由其子元礼宗作^[24],《元赞远墓志》由季弟元昭业作^[25]。洛阳邙山碑志取法江左文风,是贵族庙堂文学的典范,皆辞藻华丽、韵律铿锵、对仗工整、精于用典的骈体。元魏宗室熟练使用骈文,无疑是江左文学的忠实受众。

江左名士沿袭魏晋风度,视游园宴饮为重要的社交手段,觥筹交错、直抒胸臆,在美景佳酿的刺激下尽情释放个性。《梁书》卷三三《王筠传》:“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王)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同书卷五〇《文学下·谢几卿传》:“居宅在白杨石井,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宾客满

[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40页。

[2]《魏书》卷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7页。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第68页,第168页,第172页,第226页,第240页,第246页,第250页,第295页,第360页,第107页,第141页,第169页,第172页,第239页,第309页,第289页,第76页,第216页,第255页,第310页。

[13]《魏书》卷七《孝文帝纪下》,第187页。

[14]《魏书》卷八五《文苑列传序》,第1869页。

坐。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志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既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元魏效仿江左，游宴在士人群体中广泛流行，宗室是主要的召集者，墓志对此有精彩描述。《元扬墓志》：“赋篇章，引渌酒，奏清弦，追嵇阮以为俦，望异代而同侣。”^[1]《元斌墓志》：“望秋月而赋篇，临春风而举酌，流连谈赏，左右琴书。”^[2]《元湛墓志》：“爱山水，玩园池，奇花异果，莫不集之。嘉辰节庆，光风同月，必延王孙，命公子，曲宴竹林，赋诗畅志。”^[3]《元子正墓志》：“礼贤接士，终宴忘疲。致雏马之徒，怀东阁而并至；徐陈之党，慕西园以来游。”^[4]《元贊远墓志》：“宾客辐辏，冠盖成阴，绸缪赏会，留连琴酒。”^[5]《元湛（士深）墓志》：“宾僚率止，亲友具来，置酒陈辞，调琴寤语，思溢河水，言高太山。”^[6]《元暉墓志》：“礼过申穆之宾，流连枚马之容。良辰美景，满座盈樽，神王一时，自得千载。”^[7]《元显墓志》：“春日停郊，秋月临牖，庭吟蟋蟀，援响绵蛮，籍兹赏会，良朋萃止，式敦宴醑，载言行乐，江南既唱，豫北且行，诗赋去来，高谈往复，萧然自得，忘情彼我。”^[8]所谓“江南既唱，豫北且行”，明证元魏宗室的游宴活动紧跟江南风尚。这种为诗为礼举行的仪式象征决非北方文人的杜撰，传世文献可与之相印证。《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冲觉寺》：“（清河王元）怿爱宾客，重文藻，海内才子，莫不辐辏。府僚臣佐，并选隽俊。至于清晨明景，骋望南台，珍羞具设，琴笙并奏，芳醴盈罍，佳宾满席，使梁王愧兔园之游，陈思慚雀台之燕。”同书同卷《法云寺》：“（临淮王元）彧性爱林泉，又重宾客。至於春风扇扬，花树如锦，晨食南馆，夜游后园。僚采成群，俊民满席，丝桐发响，羽觞流行，诗赋并陈，清言乍起。莫不饮其玄奥，忘其褊鄙焉。”皆可谓实况之写照，其雅趣与江左无异。

江南贵族体制与理念成熟稳固，士族人物仰仗荣冢枯骨，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久而久之，助长了安富尊荣、鄙薄实务的习气。《颜氏家训》卷四《涉务》：“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文义之士，多迁诞浮华，不涉世务。”蒙思明评述道：“他制造一种空气，使人感觉不涉事务为高远，而躬亲事务为庸俗，因而形成一个禁人作事迫人偷闲的世风。”^[9]因此，即便入仕，也要摆出一副迫不得已、渴望隐逸的高姿态。元魏宗室深得其中要领，墓志随处可见“大隐隐于朝”的虚伪论调。《元绪墓志》：“以君国懿道尊，雅声韶发，乃抽为宗正卿。非其好也，辞不得已而就焉。”^[10]《元扬墓志》：“为步兵校尉，并非其好……迁左中郎将，加显武将军。虽首冠缨冕，不以机要为荣，腰佩龟组，未以宠渥为贵。故常求闲任，安第养素。”^[11]《元昭墓志》：“俄迁为主文中散殿中郎中。非其情愿，聊从容自得。”^[12]《元茂墓志》：“此官之来，简在帝心，非君所好，遂遁乞归。”^[13]《元熙墓志》：“迁给事中。王性不偶时，凝贞独秀，得其人，重之如山，非其意也，忽之如草。”^[14]《元举墓志》：“暨大驾纂戎，禁卫须人，伯王申举，简充直后，虽迫日月，非其好也。易尚随时，隐显由心。”^[15]《元彝墓志》：“除羽林监，非其好也。性乐闲静，不趣荣利。”^[16]《元子遂墓志》：“起家为给事中，非其好也。”^[17]《元道明墓志》的表述更加极端：“除宣威将军给事中。君深尚洗耳之高风，不贵吹竽之滥职，乃解缨辞縕，请归林壑。帝方体君器干，维絷不已。”^[18]甚至不惜以去职成就声名。如所周知，仕宦是宗室安身立命，保持贵族性的根本。现实生活里猎官者投机钻营，无所不用其极。《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高凉王孤传附珍传》：“世宗时，（元珍）曲事高肇，遂为帝宠昵。”同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常山王遵传附昭传》：“世宗时，（元）昭从弟晖亲宠用事，稍迁左丞。世宗崩，于忠执政，昭为黄门郎，又曲事之。”又卷八七《节义·张安祖传》：“时有元承贵，曾为河阳令，家贫，且赴尚书求选，逢天寒甚，遂冻死路侧。”候补者络绎不绝，争讼纷纭，逼迫朝廷采取“停年格”，一味论资排辈，递次授职。由此可知，元魏宗室墓志自诩清高，无非是攀附江南贵族时尚，沽名钓誉的手段而已。

除玄谈、文学、宴饮和务虚外，江南元素在元魏宗室墓志中还有其他零星表现。南学排斥繁琐的

[1][2][3][4][5][6][7][8][10][11][12][13][14][15][16][17][18]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第140页，第239页，第246页，第309页，第357页，第369页，第360页，第53页，第75页，第144页，第163页，第169页，第215页，第226页，第401页，第255页。

[9]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训诂,倡导约简的义理。《元秀墓志》:“好读书,爱文义。”^[1]《元熙墓志》:“好学博通,善言理义。”^[2]《元固墓志》:“优游文义。”^[3]《元馗墓志》:“文义早著,经通行脩。”^[4]他们摆脱考据的窠臼,讲究思想的阐发,风格近似南学。书法是六朝文士必备之技能,书风最能展现南北差异。北朝尊奉汉代技法,推崇浑厚古朴、端庄凝重的古体;江南则流行清新雅致、秀逸灵动的新书。南学北渐,元魏宗室难免弃北从南。《元暉墓志》:“草隶之工,迈于钟索。”^[5]《元显墓志》:“善草隶。”^[6]通常认为,草隶是楷书、行书、草书和行草的统称,经过两晋钟繇、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的提炼升华达到艺术的高度,深受江左士人喜爱^[7]。另外,邙山宗室墓志普遍采用的魏碑体,兼具隶楷神韵,无疑借鉴了蕴藉洒脱的江左书风。

三、元魏宗室吸纳江南元素的原因、途径及意义

中古南北文化的交融是元魏宗室气质修养江南化的先决条件。南北朝尽管划江而治,战火不熄,但军事的森严壁垒无法阻绝经贸文化的正常往来。即便在紧张对峙的时刻,南北官民仍未放弃沟通对话的努力。张承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交往》(《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对此论议甚详,此处仅举数例说明。当时南北边贸异常繁荣,“贩贸往还,相望道路。”^[8]《魏书》卷一一〇《食货志》:“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梁书》卷一六《张稷传》:“郁州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文化交流更为活跃,北魏多次向南朝访求图书,“稽颡郊门,问礼求乐。”^[9]南北互访,皆遣知名学者为使,外交会晤变成学术殿堂。《北史》卷四三《李崇传附李谐传》:“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于是,河洛地区成为南北文化激荡的舞台,元魏宗室置身其间,展示才华,学习先进,渐染南风顺理成章,这种情况最终折射到墓志的字里行间。

北魏孝文帝推进的贵族化运动是驱策宗室汲取江南文化养料的原动力。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北方民族如果同汉族接触,就无法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的命运。如果这是宿命的话,那么,与其被时势所迫,以丧失民族尊严的形式被同化,还不如保持本民族的自豪感,有意识地推进同化,更属上策。所谓保持本民族自豪感的同化,就是在自觉进行汉化的同时,把自己改变为汉族的贵族。特别是帝室必须高踞于由此产生的新贵族头上,通过贵族,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汉民族。”^[10]换言之,汉化的实质就是贵族化,即把胡汉统治者统统纳入一套阀阅序列中加以比较,而宗室凭借天潢贵胄的声威高踞冠族之首,以此混同胡汉、消弭隔阂、稳固社稷。对宗室而言,尽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仅凭权力、血统和荣耀仍不足以跻身贵族上流社会,文化仍是致命的短板。欲在激烈的门第竞争中独占鳌头,就不能按部就班地从基础知识开始,而是抢占学术高地,径直与贵族时尚接轨。江南是公认的华夏文明之正宗、贵族主义之先锋,元魏宗室抛弃地域、种族偏见,积极靠拢南学就成为制胜的诀窍。从这个意义上说,宗室墓志标榜南学具有极为功利的现实考虑。

元魏保障宗室的正当权益,给予充裕的施展空间,允许自由选择文化类型。因此,宗室接触江南新学丝毫不受阻碍,途径多种多样。除正常的文化交往外,还有三种重要方式。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特别强调南朝降臣刘昶、王肃等人在传递江左制度因子过程中的媒介作用。同时,他们与元魏宗室过从甚密,带给其贵族文化的熏陶。琅琊王肃与彭城王元勰惺惺相惜,二人公务之余常在

[1][2][3][4][5][6]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第169页,第211页,第301页,第218页,第360页。

[7]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6页。

[8]《魏书》卷六九《袁翻传》,第1539页。

[9]《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819页。

[10][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页。

尚书都省切磋诗文，唱和应对^[1]。王肃子侄多入宗王幕府供职，督导封君言谈举止。《魏书》卷六三《王肃传》载，王诵“学涉有文才，神气清俊，风流甚美……(转)汝南王友”；王翊“风神秀立，好学有文才。历司空主簿、清河王友。”再如景明初年归魏的河东裴氏亦以风仪见胜，裴粲“神情闲迈，举止抑扬，(高阳王元)雍目之不觉解颜。及坐定，谓粲曰：‘相爱举动，可更为一行。’……又曾诣清河王怿，下车始进，便属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节。怿乃令人持盖覆之，叹谓左右曰：‘何代无奇人！’”^[2]此外，北魏皇族累世联姻国宾，如元扬、元渊、元湛娶琅琊王氏，元宝月、元德隆纳兰陵萧氏^[3]。江南闺秀知书达理、仪态万方，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对改善宗室的气质风貌大有裨益。

战俘也是元魏宗室了解江南时尚资讯的来源。《魏书》卷九〇《逸士·冯亮传》：“冯亮，字灵通，南阳人，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览诸书，又笃好佛理。随道恭至义阳，会中山王英平义阳而获焉。英素闻其名，以礼待接。亮性清净，至洛，隐居崧、高，感英之德，以时展勤。及英亡，亮奔赴，尽其哀恸。”冯亮与中山王元英倾心交往，情景感人至深，元英一门贤才辈出，与其传授不无关联。《梁书》卷三六《江革传》：“(江革)遂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延明将加害焉，见革辞色严正，更相敬重。时祖暅同被拘执，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铭》。”安丰王元延明求贤若渴，江南学术的最新成果为其礼乐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和解决疑难的技术方案。

元魏宗室因缘际会，还能亲赴江东，实地观摩考察。史载，孝明帝正光年间，权臣元叉篡权，相州刺史、中山王元熙举兵勤王，事败身死，其弟元略渡江潜逃，受到梁武帝的热情款待。《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追光寺》：“萧衍素闻略名，见其器度宽雅，文学优赡，甚敬重之……乃封略为中山王，食邑千户，仪比王子，又除宣城太守，给鼓吹一部，剑卒千人。略为政清肃，甚有治声。江东朝贵，侈于矜尚，见略入朝，莫不惮其进止。”临淮王元彧也有类似经历，《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附彧传》：“会尔朱荣入洛，杀害元氏。(元)彧抚膺恸哭，遂奔萧衍。衍遣其舍人陈建孙迎接，并观彧为人。建孙还报，称彧风神闲俊。衍亦先闻名，深相器待，见彧于乐游园，因设宴乐……及知庄帝践阼，彧以母老请还。”元略、元彧避难江东，通过与南朝士族频繁交际，把江左风流尽收眼底，待其回归洛阳，必定如实反馈情况，为宗室加强修养提供参照。

北朝南风劲吹，推动中古文化格局的转型，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江南元素的有机融入迅速弥补元魏宗室的素质缺陷，使之形成文化自信、身份自觉，加速了贵族化进程。《魏书》卷八五《文苑·裴伯茂传》：“(裴)伯茂侮慢殿中尚书、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启，称：‘伯茂弃其本列，与监同行；以梨击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掣衣。’”宗室元景哲以“冠服”自居，在礼仪体统方面谴责汉人大族河东裴伯茂，表明他具有贵族式的修养和行为习惯。唐代谱学大师柳芳曾将中古士族划分五类：侨姓、吴姓、山东郡姓、关陇诸姓和虏姓，元氏位列虏姓之首^[4]。江南元素在拓跋氏由部落酋豪向衣冠士族的蜕变过程中居功至伟。其次，江左时尚带动元魏宗室文化水平的提高，儒雅文士的比重彻底压倒愚鲁憨直的武将^[5]。同时令其以对等之主体角色跻身贵族社交圈。杰出代表如临淮王元彧，史载他“博通典籍，辨慧清恬，风仪详审，容止可观。至三元肇庆，万国齐珍，金蝉曜首，宝玉鸣腰，负荷执笏，逶迤复道。观者忘疲，莫不叹服”^[6]。宗室才俊还可荣获大姓名士的清议，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聪、司徒崔光品评元孚：“此子当准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见耳。”^[7]司徒崔光赞许元子孝：“后生领

[1]《魏书》卷八二《祖莹传》，第1799页。

[2]《魏书》卷七一《裴叔业传附裴粲传》，第1573页。

[3]分见诸人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72、356、358、178、308页。

[4]《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中·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78页。

[5]孙同勋：《拓跋氏的汉化及其他——北魏史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6]杨衒之、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四《城西·法云寺》，第201页。

[7]《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临淮王谭传附孚传》，第424页。

袖,必此人也。”^[1]又月旦元显和:“元参军风流清秀,容止闲雅,乃宰相之器。”^[2]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宗室都有江左新风的痕迹,他们后来居上,享誉士林与之休戚相关。再次,元魏宗室沐浴江左士风,不可避免地沾染消极怠惰、不务实际的习气,这在墓志材料中显露无遗。《元孟辉墓志》:“君以乐道不迁,左琴右书,逍遙自得。”^[3]《元斌墓志》:“虽名拘朝员,而心栖事外,恒角巾私圃,偃卧林潮。”^[4]《元爽墓志》:“虽缨绂日加,位业弥峻,处是荣贵,澹若浮云,独运虚舟,与物无竞。”^[5]由是,北魏上层进取精神衰颓,尚武之风锐减,对军政局势的掌控能力直线下降。孝明帝正光末年,六镇、关陇民变,宗室领兵征讨屡战屡败,难堪大用。武泰元年(528年),契胡酋长尔朱荣引铁骑入洛,发动河阴之变,宗室贵胄束手无策,无奈引颈就戮,重蹈两百多年前西晋永嘉之乱的悲剧。所以说,中古内徙胡人汉化、贵族化语境下的江南取向是柄双刃剑,它在导演自身进化的同时,也为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这是倡导变夷从夏的改革家们始料未及的。过度的文明与精巧必将导致柔弱和繁琐,冰冷的元魏宗室墓志似乎在无声诉说,一切妄图征服华夏的野蛮异族永远无法摆脱这个魔咒般的宿命。

[责任编辑:肖 波]

A Study on the Jiangnan Elements in Royal Clan's Epitaph of the Yuan Wei Dynasty

Liu Jun

Abstract: Yuan Wei royal clan's epitaph was the be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Luoyang Mang Mountain unearthed epitaph, which was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six dynasties aristocratic spirit and highlighted the concept and the result of the medieval north Hu nobility movement. Literacy was the core link of this kind of epitaph. It wa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e Jiangnan fresh air that led the aristocratic fashion occupied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by analyzing its detailed structural elements. In the wave of sweeping the aristocratic progress, there existed a growing trend of the Jiangnan style for the Yuan Wei royal clan. This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at wrote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Keywords: Yuan Wei dynasty; royal clan's epitaph; Jiangnan fashion; culture; nobility

更正启事

本刊2014年第1期刊载的《协同与创新:员工帮助计划与企业社工关系研究》一文,由于沟通不畅,误发了作者已撤稿的论文,现作撤消处理。

本刊2015年第1期刊载的《试论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城市文化生态建设》一文,作者潘飞单位更正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产业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产业安全与发展研究基地经济学博士后。

[1]《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上·阳平王新成传附子孝传》,第442页。

[2]《魏书》卷一九《景穆十二王上·济阴王小新成传附显和传》,第449页。

[3][4][5]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第140页,第308页。